

要素价格重估需要全面供给管理

张荣楠

眼下控制通胀成为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中国的通胀问题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输入型的还是流动型或是成本推动型的?确实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涨价是对长期要素价格失衡的回报

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里德曼式经典表述,其实往往产生一定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进而又唯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而事实上,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通货膨胀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长期性结构问题,单纯的行政手段或是紧缩货币,效果未必尽如人意。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当前全面的价格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报。从全球范围看,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后工业化进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

中国当前全面的价格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报。两种价格体系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而今,超过或临近“刘易斯拐点”,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阶段,需要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

中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化分工体系,由于国际竞争激烈,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此外,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以便为富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融资来源,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刘易斯拐点”推动要素价格重估

而今,中国低劳动力、低要素价格的情况将发生重大改变,即超过或临近“刘易斯拐点”。“刘易斯转折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而另一方

面,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业部门将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的快速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的CPI中轴水平,因此,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输入型或是流动性驱动型的,而是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失衡型通胀。

这就引出更大的问题,既然某种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当前通胀的重要推手,那未来一系列要素价格改革、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的改革还要不要推进,会不会因为恐惧通胀又把该做的事搁置了,中国如何在管理好通胀与推进中国经济中的重大改革进行有效的平衡?

“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

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阶段,管理通胀的正确的长期取向应该是: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时包括利率市场化、打破价格垄断定价,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在内的一系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有有序推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价格信号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扭转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焦点评论

实话实说

油企“集体违规”彰显垄断之痛

江德斌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对违规高价批发销售柴油8家企业的公开查处在市场上引发了连锁反应,从24日起,为避免挨罚,地方炼油厂集体不再提供公开报价,柴油批发贸易转入地下。值得关注的是,挨罚的企业不过是冰山一角,柴油批发市场正呈现出集体违规的怪象。

发改委高调处罚违规售油的企业,目的就是敲山震虎,让油企收敛一些。可是,面对发改委的公开惩罚,油企却玩起了“潜伏”,转入私下交易,真实批发价格仍然超出发改委的最高限价。而最为讽刺的则是,按照发改委规定的价格,贸易商根本买不到油。这一貌似荒诞的情景,实际上是宣告发改委干预油价失败,油荒不会因拍死几只“小苍蝇”而终结,只要垄断石油资源的“老虎”还在,油荒就随时有可能爆发。

我国的油价是受管制的垄断价格,如果在石油期货价格平稳时期,倒不会有太多问题。但是,我国已严重依赖于进口石油,却没有掌握石油定价权,当国际原油期货波动较大的时候,就会迅速传导至国内;而当市场化的石油价格

撞到垄断的成品油价格之时,就难免会引发冲突,垄断油企基于利益考虑,必然会权衡得失,最终形成涨多跌少、涨快跌慢的局面。

因此,油荒只是表面现象,真相是垄断油企阻碍市场,油价无法形成市场化价格,也就扭曲了市场供应,垄断油企掌控着产业链条,民企、消费者只能仰望鼻息,任其宰割。发改委的调查结果,也证明此前盛传的“拉闸限电造成油荒”是谬论,真实的情况,就是垄断油企仗着优势地位,制造供应紧张气氛,任意抬高批发价格,造成下游企业不堪重负,从而引发大面积的油荒。而在转入私下交易之后,发改委将更加无力查处,仅凭行政手段,已经无法彻底解决油荒了。

近日,随着国际石油期货下跌,国内柴油批发价也跟着小幅下跌,而这一价格联动,则表明国内油价与国际价格渐趋同步。但要想达到一致,就得打破垄断局面,让外资、民营企业参与竞争,进而形成市场化价格。打破垄断油企的利益链条,将促使经营主体多元化,并能实现储油于民的战略目标,从而摆脱油荒困扰,让消费者享受到竞争带来的利益。



财经漫画

石化双雄领首张罚单

制图/李宏宇

国际纵横

华尔街辣手整饬内幕交易“圈子文化”

李云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内部交易案调查,涉及全美多个投资顾问、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交易人及分析师。监管机构正在审查是否存在多重内部交易的团伙,它们是否非法获得总计数千亿美元的利润,当局计划在今年底之前对其中一些案件提起公诉;调查的另一个重点是核实高盛集团的银行家是否通过泄露交易信息使某些投资者受益,但高盛发言人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实际上,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监管部门打击华尔街“黑幕”的举措就开始升级。以“帆船内幕交易案”引发的对冲基金内幕交易丑闻冲击波为

例,就曾不断波及到越来越多的知名金融机构和著名企业并将之“拖下水”。早在2009年10月,美国警方就曾拘捕了相关6名嫌疑人,2009年11月美国司法部又宣布起诉了第二批共计14个嫌疑人,与此同时,FBI逮捕了其中的数名嫌疑人。这批嫌疑人包括对冲基金经理、证券交易公司的高管、律师、评级公司穆迪的分析师,以及一些IT公司人员。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涉案的关键人员几乎全是印度裔人士,呈现出了一个少数族裔群体的“内幕消息网络”。

与亚洲等新兴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更多呈现出的“亲属团”特征相比,圈子文化似乎一直是华尔街内幕交易的重要载体,“帆船内幕交易案”里的印度裔圈子只是各类内幕交易圈子中的一个浪

花而已。因为社交圈子是传播内幕交易的重要渠道,社交圈子和族裔圈子的重要载体,此前轰动一时的香港有关人士涉及“道琼斯内幕交易案”某种程度上也属此类。

除了社交圈子,“工作圈子”和“利益圈子”的结合,往往会出现在上市公司高管集体内幕交易案件的发生。1996年底至1997年初,在美国3COM公司的股价飙升至其历史最高位的时候,包括3COM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副总裁、董事在内的10名高级管理人员,在大约78.125美元的价位上卖出了大约89.6万股的公司股票,通过非法内幕交易将5930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因为该内幕交易案存在高管利用虚假陈述等证

券欺诈行为推高股价从而“高位出货”的事实,数名投资者将3COM公司告上法庭并提起集团诉讼,3COM公司及其10名高管人员最终被判向投资者赔偿2.6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只要有资本市场的地方,内幕交易事件必然就会时不时的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悄然出现,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定律。不过内幕交易虽然在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投资市场会用不同方式重复演绎,但从其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来看,每一次内幕交易事件的频繁爆发期都必然会伴随着一次打击内幕交易的风暴期出现,并对此后多年的市场风气和文化澄清产生潜在影响,而金融危机之后往往都是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活跃期。

经济时评

游资要打击 更需给制度化出口

吴睿鹤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文称,种种迹象表明,游资炒作和不法经营者采取欺诈、串通、哄抬、囤积等不正当手段操纵相关商品价格,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直接推手。这是发改委连续第三天在官方网站发文就如何贯彻“国16条”做出论述。

为遏制农产品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国务院早在5月26日,就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一旦确认游资炒作农产品,发改委将根据相关价格管理办法进行严厉处罚。

进入7月份后,爆炒农产品的“带头大哥”——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被处以100万元的顶格罚款,紧接着,山东物价局又对某大蒜经销商处以10万元的罚款。然而,重罚过后,并未吓倒农产品的“炒作家”们,“豆你玩”的闹剧继续上演,3天时间,每斤绿豆的价格就飞涨1.8元。

可是,国家用行政手段对“豆你玩”、“蒜你狠”、“辣翻天”狠狠打击后,随后又出现了一股股农产品涨价潮:生姜涨价——“将尔军”,白糖涨价——“糖高宗”,苹果涨价——“凭什么”……此起彼伏,按下葫芦瓢起瓢。

面对行政干预农产品价格的严重失灵,我觉得,很有必要站在更加宽泛的视角,来深入探究“豆你玩”、“蒜你狠”、“将尔军”背后的真正成因,以求破解之策,否则,一味地向游资施压,只会扬汤止沸。

“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背后成因,一方面是货币流动性过剩,从而导致游资畅游农产品领域。央行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共计9.59万亿元,几乎是2008年的两倍。如此高的流动

性必然产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尤其是今年4月份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在这种背景下,大量资金退出和楼市,农产品便成为一些游资的投机炒作目标。天量般地发行货币,会让通胀走完一个圆满周期,从资产产品价格,到生产成本,再到最终消费品价格。而农产品的炒作,通常被看作是资产泡沫的落幕戏。

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严重缺失。毋庸置疑,与小麦、大米等主要农产品相比,国家对绿豆、大蒜、辣椒等小农产品的确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具体讲,既没有成型的价格干预和补偿体系,也没有相应的储备投放市场平抑物价;既没有服务于菜农、果农的公共冷库,也没有用政府信誉建立起来的半公益、半市场化的中介组织。类似公共产品的缺失,不仅难以使农民在市场上“强硬”起来,而且也给了游资带来了生存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出民间资本生存空间的狭窄。在爆炒农产品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间资本。当民间有钱无处花时,就变成了游资。游资并非天生偏爱炒农产品,而是被逼无奈,才转向农产品。这反映出民间资本的合法投资路径很少。

对付当前农产品的涨价潮,要对症下药。首先国家应果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减少货币流动性。其次,政府应多向农产品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做好小农户与市场的直接连接,压缩游资炒作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要给这些游资以制度化出口。具体讲,就是抓紧落实今年5月份国务院实施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让民间资本尽快拥有广阔的投资天地和空间。

谁是游资炒作物价的推手

冯海宁

究竟谁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推手?多个部门曾经认识不一。发改委认为游资炒作是主因;而农业部官员表示,炒作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主因;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认为农产品不具有投资品的特性。显而易见,如果诊断不一样,对于“价格疯涨病”的治疗就不一样,相关部门能否进行一次会诊?

天气原因、供需失衡、游资炒作是不同部门眼中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但我更认同游资炒作,原因很简单,从基本上看供应并不短缺,而价格却是轮番上涨,农产品市场更是频频投机者身影。

可以说,游资炒作推高这一轮农产品价格,已成为部分官方机构与经济学界的共识。

那么,谁又是游资炒作的推手呢?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自明:货币发行过量。但我们不能把板子打在货币身上,而应该去追问发行货币的人。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监管者不断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本意是刺激经济增长,支持实体经济,然而,大量游资炒楼、炒农产品,人们禁不住要问,货币发行量为何没有根据实体经济需要“量体裁衣”?监管者发行的天量货币究竟多少真正进入了实体经济?

为避免货币超发引发物价继续上涨,金融监管者一方

面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收缩流动性,另一方面严查信贷资金炒作农产品。但这些举措到底能收到多少实效还是一个未知数。因而,金融手段调控物价的力度和频率还值得反思。

经过金融手段调控,是否意味着农产品价格就能回归理性?答案显然是“不一定”。因为是多头资金参与农产品价格炒作,既有国内资金,据说又有国外游资。毫无疑问,多头资金炒作农产品也与我们长期以来的投资渠道过于狭窄有关,而国外热钱流入农产品市场也与缺少监管有关,有关部门不该为此深刻反思吗?

在有关部门连出重拳控制物价的背景下,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日前再次鼓吹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在最新报告中,大幅上调了大豆和棉花价格预测,而调整后的玉米、大豆和棉花价格预测远高于此前的远期价格曲线。高盛集团这次鼓吹农产品价格是拿“耕地战争”来炒作,为此,我们要有所警惕。这是因为,中国各地的菜地减少,已经让公众尝到了蔬菜价格快速上涨的苦果。当城镇化、房地产与农产品争夺有限的耕地时,我们不得不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去反思耕地问题。以北京为例,北京市郊的菜地面积已从17万亩缩减至1万亩以下,蔬菜自给率仅为10%。我们是否进行过这方面的深刻反思?